

阿爾薩斯：極右派的搖籃？

「看到皮卡第 (Picardie) 或阿爾薩斯的消失，從我們國家的根源、歷史、特殊性和多樣性的觀點出發，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問題。」
— 瑪琳·勒朋 (Marine Le Pen)

文／洪瑞閔 (比利時法語天主教魯汶大學博士)

前言

雖然法國的史特拉斯堡 (Strasbourg) 的近代歷史發展顯現出歐洲人民揚棄民族主義與追求和平的過程，最終達成法國與德國的和解以及歐洲聯盟成立的成果，¹ 史特拉斯堡與其相鄰的德國奧特瑙地區也成為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 底下 6 個歐洲區 (Eurodistrict) 之一，史特拉斯堡-奧特瑙歐洲區 (Eurodistrict Strasbourg-Ortenau) 在 2010 年正式運作，目標是推動兩區域之間連結，作為歐洲跨國跨區域整合的典範。然而，如果我們將地理範圍放大到史特拉斯堡所屬的阿爾薩斯 (Alsace) 大區，則與歐洲整合運動相對立的極端民族主義與極右派的思想與活動似乎也正在這個歐洲整合的代表區域蓬勃發展，並未因為這些跨區整合的努力而受到壓抑。

本文探究阿爾薩斯的極右派活動，首先

將就阿爾薩斯大區近年的極右派重大活動與發展進行介紹，再者則論述造成阿爾薩斯極右派勢力蓬勃發展的原因，結語則對阿爾薩斯地區的極右派發展以及歐洲整合的未來做出展望。

極右派的活躍

阿爾薩斯的極右派活動可分為國內與國際兩層次來說明。在國內層次方面，主要表現在極右政黨國民聯盟 (Rassemblement national) 與其前身民族陣線 (Front national) 在阿爾薩斯選舉的活躍，² 自 1994 年起歷屆總統大選與歐洲議會選舉，該黨均在阿爾薩斯地區有著高於其全國平均的得票表現，這種情形在總統大選時更加明顯，如以 2017 年的法國總統大選為例，國民聯盟總統候選人瑪琳·勒朋 (Marine Le Pen) 在第一輪與第二輪的投票中在全國分別得到 21.3% 與 33.9% 的選票，然而，如表所示，勒朋在阿爾薩斯大區

¹ 有關史特拉斯堡在歐洲整合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請參考作者在巴黎視野第 55 期的文章。

² 國民聯盟的前身是 1972 年 10 月由讓·馬利·勒朋 (Jean-Marie Le Pen) 所成立的民族陣線 (Front national)，在 2011 年由其女瑪琳·勒朋 (Marine Le Pen) 接任主席之位，並在 2018 年 6 月改名為國民聯盟。有關國民聯盟與民族陣線的活動，可參考作者在巴黎視野第 34 期與第 39 期的文章。

	馬克宏	勒朋
第一輪投票		
全國	24.01%	21.30%
高萊茵	19.76%	27.16%
低萊茵	22.29%	24.70%
第二輪投票		
全國	66.10%	33.90%
高萊茵	57.97%	42.03%
低萊茵	63.07%	36.93%

表：2017 年法國總統大選馬克宏與勒朋在全國與阿爾薩斯得票情況。(資料來源：法國內政部網站)

的表現明顯地更加優異，無論是高萊茵 (Haut-Rhin) 省或低萊茵 (Bas-Rhin) 省，³勒朋的第一輪得票均超過共和國前進 (La République en marche) 的總統當選人馬克宏 (Emmanuel Macron) 而居於第一位，儘管在第二輪的選舉當中，勒朋的得票也不能自外於法國主要政黨聯合抵制極右派的趨勢而被馬克宏反超，但其差距明顯比全國平均來得小，顯示出國民聯盟在阿爾薩斯的受歡迎程度。

在國際層次方面，我們則可觀察到有越來越多的歐洲極右派活動在阿爾薩斯地區舉行。這些活動的策劃者主要是來自德國的新納粹成員，例如 2019 年 11 月德國極右派人士便在高萊茵省的省會科爾馬 (Colmar) 附近進行集會，其中包括多位德國極右派政黨「德國另類選擇」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AfD) 的代表，主要目的乃是要紀念 1938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納粹黨人襲擊德國境內猶太人的「水晶之夜」 (Kristallnacht) 81 周年。⁴綜觀其活動的舉辦策略，為了要使活動合法化，其主要是以私人聚會或體育活動的名義向當地政府與房東提出申請，如以前述活動為例，主辦單位是以「身處在多元文化社會德意志人民的永存」為主題進行活動申請。⁵其實，不只是阿爾薩斯大區，法國東部與德國連接的邊境地帶如洛林 (Lorraine) 與莫瑟爾 (Moselle) 等地都有許多新納粹的活動。這樣的極右組織活動似乎也逐漸地在地化，如在 2021 年 8 月科爾馬的警方逮捕了一名 26 歲的法國男性，在其住所發現 4 顆自製的鈾炸彈以及納粹的徽章等物品，令人擔憂的是該名犯嫌並未列名在法國情報部門的可疑份子清單之中。⁶

³ 在行政區劃分方面，阿爾薩斯由低萊茵與高萊茵兩省所組成，其省會分別是史特拉斯堡與科爾馬。

⁴ & ⁶ “Haut-Rhin : des bombes artisanales, de l’uranium et des croix gammées découvertes, un suspect mis en examen,” Libération, September 8, 2021, https://www.liberation.fr/societe/police-justice/haut-rhin-des-bombes-artisanales-de-l-uranium-et-des-croix-gammees-decouvertes-un-suspect-mis-en-examen-20210908_MHS5PYZ6N5EJQL6EJOT6DBYRRQ/.

⁵ “A propos du congrès de la Deutsche Burschenschaft du 8 au 9 Novembre 2019 en Alsace,” Autonome Antifa Freiburg, November 7, 2019, <https://autonome-antifa.org/?article381>.

極右派的茁壯之因

我們可以將極右派在阿爾薩斯的茁壯分成普遍性與特殊性等兩個面向來思考：

一、普遍性：

如同法國其他地方，極右派在阿爾薩斯的崛起受益於法國自 1990 年起的社會經濟變革所造成的政治氛圍轉變。隨著冷戰的結束與歐盟的東擴，法國開始湧入了大量來自中東歐的移民，造成諸多經濟與社會問題，對於那些厭惡移民的法國人來說，主打維持秩序與守護傳統的極右派論述就十分有吸引力。作為法國東部的邊境地帶，阿爾薩斯便是中東歐移民前往法國的第一站，對於這些移民的體驗最早也最深，國民聯盟即在這裡以維護傳統為號召，諸如「阿爾薩斯優先」（L'Alsace d'abord）、「我們想要保持現狀」等口號，對於爭取重視地方傳統選民的青睞有相當助益。

同時，阿爾薩斯的極右勢力發展也得益於 21 世紀開始法國選民對主要傳統左右派政黨無能的不滿浪潮，主要右派政黨共和黨（Les Républicains）在此區的選票逐漸地被極右派勢力所接收，自 2010 年代開始基本上國民聯盟的支持度已穩定超越共和黨。

此外，相較於德國法律對於極右派與納粹言論與活動的嚴格規範，法國對於此類議題的規範並不如前者嚴謹，這使得極右派團

體有機可乘，利用地緣的便利性來進行活動。

二、特殊性：

比起法國其他地方，阿爾薩斯的極右派發展更反映出阿爾薩斯的特殊性。從歷史的角度出發，1870 年的普法戰爭（Franco-Prussian War）使阿爾薩斯被割讓給德國，一直到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後才又回到法國手中，此一過程造成阿爾薩斯與法國其他地方的政治發展有了不同，在 1918 年阿爾薩斯回歸之際，相較於當時法國各地社會主義黨派的蓬勃發展，阿爾薩斯並未有左派勢力，因此在政治光譜上，阿爾薩斯傳統上屬於右派的勢力範圍，自 1958 年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總統所推動建立第五共和（Cinquième République）體制開始，此一地區就是強調獨立自主與反對被經濟自由主義戴高樂主義黨派所宰制。

此外，阿爾薩斯的產業特殊性也有利於極右派的支持度增加。阿爾薩斯以散布在鄉村地帶的工業為主要的經濟活動，隨著全球化的經濟轉型，阿爾薩斯的鄉村工人大量失業，在缺乏左派傳統與主流右派政黨無能的背景下，這些失業工人選擇支持強調保護主義的極右派政黨，從選舉的結果來看，國民聯盟在阿爾薩斯博斯（Alsace Bossue）、高佛日山脈（Hautes-Vosges）以及米盧斯（Mulhouse）等主要工業地帶均享有高度的支持。⁷

⁷“Rassemblement national en Alsace: un vote populaire,” CUEJ info, October 24, 2019, <http://www.cuej.info/dossiers-multimedias/elections-europeennes-le-grand-est-poursuit-sa-recomposition-politique-1>.

結語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整合的初始階段，包括法國的莫內（Jean Monnet）與舒曼（Robert Schuman）、德國的艾德諾（Konrad Adenauer）、義大利的賈斯巴里（Alcide De Gasperi）在內的「歐洲之父」們（The founding fath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貢獻卓著，他們當中的大多數所具備的一項共同特徵是「邊境經驗」，例如舒曼的家庭來自於法國與德國邊境的洛林（Lorraine），賈斯巴里則出身自奧地利與義大利邊境的提洛爾（Tyrol），身處邊境的這些人深刻體驗了國家間為了領土爭奪所引發的無數戰爭，使得他們比起其他人更容易了解到民族主義無限上綱所導致的惡果，因此邊境地區的人們被

認為是因為自身環境特色而更容易跳脫出狹隘國家格局以更宏觀的視角看待共同的利益。

然而，今日阿爾薩斯的發展卻為這種「邊境經驗」帶來了截然不同的觀點。儘管史特拉斯堡設有包括歐洲議會與歐洲人權法院在內等諸多歐洲或歐盟相關的機構，今日已經與布魯塞爾以及盧森堡並列歐盟的三大重心，但是其所位處的阿爾薩斯大區並未因此放棄極右派論述與民族主義，甚至背道而馳成為其發展的溫床。這樣的現象值得歐盟的政治菁英們進行反思，除了組織設置已經不足以遏制當初他們所懼怕的民族主義巨獸以外，如何使歐洲國家邊境地區的人民具體地從整合過程受益更是日益迫切的問題。



Strasbourg 街景。(筆者攝)